

秋窗骋思录

毛承志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学者评论家近作文丛

学者评论家近作文丛

秋窗骋思录

毛承志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学者评论家近作文丛
秋窗骋思录
毛承志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76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10.375印张 235千字 1998年7月第1版
199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定价:15.60元

ISBN 7-5434-3252-8/I·377



总 序

张 炯

对文学作品的评论,可以说跟文学作品的创作一样久远。因为作品是供人欣赏的,总得有读者或观众与听众。欣赏之后人们便不免要议论、要交换自己的观感。这难道不就是评论吗?马克思曾说:“……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惟一判断者。”^①指的就是这种群众性评论的历史存在。至于专业评论家的评论,它的产生自然比群众性的评论要晚。正如人民的口头创作早于作家的创作一样,人民的口头评论自然先于评论家的评论。评论家作为专业出现,那是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结果。在这方面就我国而言,删诗三百,编选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并有诗论的孔子,恐怕算得上中国文学评论家的始祖了。历史上的文学评论家,往往为学者兼任,这并非偶然。因为真正有见地的文学评论,并不限于就作品论作品,正如鲁迅所指出的,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

^①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 学者评论家近作文选

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①评论家要做到“知人论世”，就得有广博的知识，有宽阔的学术视野。评论作品不但要有文学史的比较的眼光，而且要通晓社会历史的许多方面的知识。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上的评论家、特别是影响大的评论家常常都是学者，即使不是学富五车，也得是博览群书的。

当然，这不是说凡学者都能成为文学评论家。因为文学评论家除了学问，还得有艺术感受力和鉴赏力。所以，学者而又能兼做文学评论的人，历来也不是很多。

就文学来说，评论家一向不如作家知名。文学作品一旦创作出来就能满足人们审美的需求，读者多，传播广，作家的知名度大就很自然。而文学评论的读者一般都比文学作品的读者少，这大抵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不等于文学评论不重要或没有价值。相反，它的重要价值也不可小觑。文学评论不但是作者与读者的桥梁，它向读者阐释作家创作的意义、特色，又把读者的褒贬喜恶反馈给作家，好的评论还能充当作家的诤友和读者的良师，以宏阔的视野和精辟的见地，使作家和读者都能从中获益。评论家从丰富的文学现象中给作家作品以历史的定位，并从对众多作家作品的研究中升华出理论，从而帮助作家和读者更好地认识文学艺术的规律，并自觉地运用这些规律性的知识去促进文艺的繁荣。因此，人们把文学评论看做是文学领域不可缺少的一翼，正是基于对这项工作的重要价值的一种认识。

今天，我国人民正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尤有重要的意义。

① 鲁迅：“题未定”草》，见《鲁迅全集》，第6卷，43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而要使文艺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并繁荣起来，加强文艺评论便必不可少。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的繁荣应该说与文学评论的促进作用分不开。没有理论批评方面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没有文艺评论对许多作家作品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和宣传，很难设想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会有今天这种繁荣的局面，虽然这种繁荣从根本上说是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欣欣向荣相联系的。

为了加强文艺评论，党和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新时期文艺评论能够获得比以往更好的发展，成长起一批又一批新的文艺评论家，正跟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环境的不断改善分不开。可是，比之蓬勃发展的文艺创作，文艺评论无论在力度上，在人才的聚集上都显得不足。评论著作出版困难，评论队伍不断走失，更使得文艺评论在进入90年代日益产生危机感。人们不满评论界的“疲软”和“失语”，感到评论著作太少。而评论家又确有许多是努力写作的，他们看到不少同行纷纷改向，或写散文、或写小说去也，深感耕耘于评论领域的寂寞与困窘，却还是坚守在这个寂寞的岗位上。在这种情势下，如何促进文艺评论的开展，实在是一个健全的社会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河北教育出版社是近年以重视国家文化建设而引人注目的出版社。为了扶植文学评论，慨然答应斥资出版这套“学者评论家近作文丛”，实在是一件富于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的文化盛举。学者评论家是当今文艺评论队伍中有自己特色和独特成就的一支队伍。他们大多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从事学术工作，主要从事教学、编纂和研究工作，往往兼治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虽然他们的主要精力多不在当前的文学评论，但建国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他们都撰写了不少评论文字，在文学界产生过相当的影响，其中不少人还被认为是知名的评论家。在参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近两千名会员中，大多数都

4 学者评论家近作文丛

是在高等院校从事教学科研而又兼写评论的。本套丛书由于篇幅所限，只能先推出部分学者。将来如果能获得出版界的广泛支持，希望能有更多的选本与读者见面。

丛书中所选文章是由作者自选的，主要是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近期的论著。这些作者大多出版过评论集，此次选本中既选有见于以往评论集但作者自认为颇具学术价值、代表其本人一定时期学术成就的篇章，也选有尚未编集出版的近期评论新作，涵盖作家、作品评论和专题理论研究与探讨的文字。总体上希望这些选本能有助于读者了解有关评论家的大体成就或某一方面的突出成就。由于这些评论家大多活跃于新时期的文坛，因而，从他们的评论文字中，人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时期我国文学发展的概貌和对许多著名的或新起的作家以及他们的创作成就的有关见解。

我们新时期的文坛由于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也走向多元。读者可以看到，丛中各家的观点与方法也并非一样，而且各有自己的批评风格。这些评论家中，有的多作宏观性批评，有的多作微观性批评，有的多评诗歌，有的多评小说，有的多评少数民族文学，有的则多有理论的论述，这大体上是反映了各人平时研究视角的差异，也一概尊重个人的所选。

这套丛书的顺利出版，特别应该感谢河北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王亚民同志和责任编辑。除了对他们的热心支持和辛勤努力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和敬意外，对出版社为本丛书的出版做出贡献的全体同志，我们也致以深切的谢意。

1997年4月20日于北京



目 录

对建国后十七年文艺评论的回顾和评估

——《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评论集》

导言……………（1）

论共产主义思想与文艺……………（20）

努力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新观念、新方法……（33）

愿天下有心人都来培土浇花……………（36）

现实主义深化的一个重要课题

——读近几年中篇小说创作随感……………（44）

电视艺术评论的美学要求

——在广播电视评论座谈会上的发言……………（50）

当代英雄的典型形象

——评《乔厂长上任记》及其批评……………（55）

人类向上精神的一种闪灼

——试论《人到中年》的现实主义力量……………（84）

东风绽开的一朵新花

——喜读《能媳妇》……………（126）

2 秋实诗思录

寓浓于淡 妙造自然

- 秦兆阳《农村散记》赞…………… (135)

寒凝大地发春华

- 读长篇小说《大地》…………… (149)

血与泪的悲歌和颂歌

- 评从维熙近两年小说创作的思想艺术特色…… (154)

试论《泥泞》的悲剧美…………… (180)

悲剧不悲

- 评《大墙下的红玉兰》…………… (211)

人民英雄的丰碑

- 评新版《晋察冀诗抄》…………… (218)

矮檐下的炎凉世界

- 论萧乾小说的反封建主题…………… (248)

拔一根毛毳以窥其全豹

- 论萧乾小说的反宗教倾向…………… (269)

同情在弱小者一边

- 论萧乾小说中的底层人物…………… (300)

- 后 记…………… (321)

对建国后十七年文艺评论的回顾和评估

——《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评论集》导言

一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七年（1949—1966），被公认为当代文艺运动史的第一时期。在此期间虽然有种种错误干扰，尤其是1962年以后，“左”倾错误曾经发展得相当严重，但总的看来，正如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中所指出的：“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所谓‘黑线专政’，完全是林彪、‘四人帮’的诬蔑。”

建国后十七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文艺走过了一段艰辛曲折的道路。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沿着正确方向有所开拓，有所前进，在创作和理论批评两个领域内都取得了建国后的第一次重要的收获，从而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建设、创新奠定了基础。

但是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在发展过程中，确又曾饱受“左”倾思潮的危害之苦。先是遇到文艺领域内外存在的

2 秋宵静思录

以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为特征的若干“左”的思想观点的干扰，继则受到了几次以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的批判运动的严重冲击。

到第一个十年的末期，“左”的错误愈演愈烈。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都涉及文化艺术阵线，日甚一日地把文艺问题、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和等同起来，以行政领导方式和大规模群众斗争取代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和学术讨论，从而严重地扭曲和破坏了艺术民主，违背和抹煞了文艺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在这种情况下，文艺批评原已存在的主观武断、简单粗暴之风，不仅难于纠正，而且每况愈下。影响所及，使一大批作家、艺术家、评论家和后起之秀不能解放思想，大胆从事创作活动和开展正常的理论研究，从而也就束缚和限制了艺术个性和创造才能的充分发挥。

1957年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将一大批有才华，有作为，在艺术上、学术上勇于探索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打了下去。接着在60年代又进行了一系列过火的错误的思想批判和文艺批判（如对所谓“人性论”和“人情味”的批判，对《早春二月》等电影的批判，等等），这样无论是在组织领导上还是文艺理论上，都形成了越来越多的清规戒律、越来越多的禁区，致使文艺创作的路子越走越窄，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长时间内不能得到正确的阐释和贯彻。

在这种土壤和条件下造成的虚假的“舆论一律”，自然很容易为一伙政治野心家、阴谋家所乘。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利用指导思想上“左”的严重错误，篡夺了党的一部分权力，大搞封建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使我们的文坛，包括文艺领域在内的整个文化界陷于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悲惨境地。直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一场伟大的

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文艺领域才获得了新生。

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从1957年到1978年，我们吃亏都在‘左’。”^①他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又说：“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②

小平同志的这段话如同黄钟大吕，意味深长。我们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学习，认真领会，并用来自正确地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七年”间我国当代文艺运动的经验教训。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前几年社会上以至文艺界一度泛滥的自由化思潮，其中被这股思潮所引发的一种从根本上否定“十七年”文艺成就的观点，就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这实际上是当时虚无主义、骂倒一切的自由化风气的一种反映。

有些人认为，“十七年”间整个文坛都被“左”倾思潮所控制。“左”毒不仅侵蚀败坏了文艺理论，而且将文艺创作引进了误区，致使整个文坛呈现出一片荒芜。有人甚至用嗤之以鼻的态度宣称，建国后十七年不过是新文艺运动史上无可称道而只有“左”倾后遗症的一段时期。对“十七年”文艺成就如此非难，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从实践看也与事实不符。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非常片面、极其错误的。否定一切的行径貌似时髦，实则陈腐。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力地批判过：这

① 邓小平：《我国方针政策两个基本点》，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2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②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3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 秋窗静思录

是“一种恶劣的没有结果的否定”，“是纯粹主观的、个人的否定，它不是事物本身的一个发展阶段，而是由外部硬加进去的意见”^①。

历史总是在充满复杂的矛盾斗争中曲折前进的。在不回避“十七年”间确实存在“左”倾错误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正是置身于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我们不仅有着一条基本上正确的文艺路线在指引方向，而且还存在一支继承了“五四”和30年代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分别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经受过战斗洗礼的文艺队伍，因此这个时期的新文艺，就不可能和历史长河中整个社会的进步、科学文化的进步相脱钩，而单纯接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和制约，只是和“左”倾错误相联系，只有“左”倾后遗症。

严肃地指出长期以来文艺指导思想中“左”的错误对文艺的恶劣影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也应当看到，“左”的东西从某些“左”的表现滋长为“左”的倾向，再发展为“左”倾思潮以至极“左”，它有一个长时间发展的过程。而人们对“左”的错误倾向及其严重危害性，也有一个不断加深认识和反复抵制

的过程。

开国初期逐渐滋长起来的实用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导致了文艺批评的简单化、庸俗化，从而助长了创作中的概念化、公式化。这种“左”的倾向，在批评电影《武训传》的错误和随之而来的文艺整风中已有所发展。

1953年9月召开的第二次文代会，对“左”倾教条主义在文艺领域的影响进行了建国后第一次的批判，初步清算了文艺

^①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3—6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及其他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同时对文艺批评上的简单化、庸俗化以及组织领导上以行政方式干涉创作，也作了初步的反拨。这次大会对推动文艺创作走上健康的现实主义道路，促进文艺的繁荣发展起了不可抹煞的积极作用。

1954年开始的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固然发展了以政治批判取代学术探讨的“左”的倾向。那么，在1955年文艺整风中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更是“十七年”中最政治化、简单化的一次文艺批判，对“左”倾文艺思潮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和初步实践，使文艺界出现了建国后从未有过的思想的活跃和解放。在文艺批评和理论研究上突出地表现为摆脱教条、联系实际、冲破禁区、大胆探索的精神。秦兆阳、周勃、钟惦棐、钱谷融、巴人、陈涌、孟凡等人的文章，多方位、多角度地向教条主义和“左”倾文艺思潮开火。这是建国以来集中反“左”、且最富于学术性、对文艺繁荣最有促进意义的一次总演习。以反对教条主义和“左”倾文艺思潮为中心，展开了关于我国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关于典型、关于形象思维以及美学等众多学术问题的探讨；对于如何理解文艺为工农兵和为政治服务，政治性与真实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歌颂与暴露，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文艺的特征和规律以及如何贯彻“双百”方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大胆地提出质疑，进行了独具创见的新的探索。特别是从不同的角度对文艺批评中的简单化、庸俗化倾向，文艺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文艺组织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倾向和“一棍子打死”的粗暴作风，都切中时弊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1956年上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文艺界思想的活跃和解放，急切地呼唤文艺早春天气的来

临。文艺创作呈现出一派盎然生机，多种形式的文艺创作都涌现出了一批颇具艺术特色和思想深度的优秀作品。

可惜这种活跃和兴旺的新气象，不久就由于“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而受到极大的挫伤。随着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出现了“左”的错误，作为“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在发展中也经历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是，尽管如此，这个时期的文艺创作仍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文艺在十年的坎坷历程中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一方面建国后的头八年，新文艺一直在稳步发展，并不断走向成熟。一方面政治运动的缺点错误和文艺批评的“左”的倾向，虽然对文艺创作产生过消极的影响，但是，文艺界的健康力量并没有被压垮，他们在艰难的处境中仍然顽强地坚持按文艺自身的特殊规律和现实主义的法则从事文艺实践；并在不同时期、不同岗位上，自觉不自觉地对“左”的倾向进行了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斗争；加上他们拥有长期的生活积累和丰富的创作经验，因此“大跃进”前后，一批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优秀文艺作品得以相继问世，就不是偶然的了。正是这些佼佼者标志了社会主义文艺的逐步成熟。

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在作祟，文艺领域就不断地受到干扰和侵害。1958年，在组织文艺“大跃进”的同时，又开展了对所谓“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主要指“反右”斗争中被打成“毒草”的论文及作品）的大批判。1959年5月3日，周恩来同志作了《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重要讲话，从思想方法上严正地批评了文艺工作中“左”的错误。然而，曾几何时党内开展了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在文艺领域再一次掀起“批修”的高潮，将一些针对“大跃进”以来以政治代替艺术的“左”的倾向提出过正当批评的同志，以及

若干真情流露的好作品横加挞伐。“左”的错误思潮从此愈演愈烈。

面对持续三年的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文艺工作同样迫切需要调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同志于1961年6月19日发表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但是，由于受到“左”倾思潮的干扰和抵制，这个批“左”的纲领性文献在当时未能公开发表，更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从1961年至1962年，在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文艺领导部门主持召开了多次重要会议，撰写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与文件，对党的文艺政策进行了调整，在文艺指导思想上纠正“左”的错误，并对某些受过错误批判的作家、作品落实了政策。

1961年第三期《文艺报》发表了名为《关于题材问题》的重要专论。

1961年6月，中宣部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文化部召开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两会的中心议题都是纠正文艺工作中“左”的错误。遵照周总理讲话的精神，前者制订了《文艺十条》（后定稿为《文艺八条》）。

1962年2月18日，周总理在紫光阁召开了在京一百多位剧作家参加的座谈会。3月在广州召开了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周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在两会上都作了重要的报告和讲话。

1962年5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重要社论。

1962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邵荃麟针对文艺创作中的“左”的倾向，提

8 秋雷腾思录

出了“人物形象多样化”和“现实主义深化”的问题，表现出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理论勇气。

60年代初期，文艺政策的调整，对“左”的错误的初步批判，有力地激发和提高了作家、艺术家和评论家从事创造和研究的积极性。文艺创作的题材、体裁、风格多样化，取得了新的拓展，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理论工作、学术讨论也出现了新的活跃气氛。这一时期各地报刊就题材问题、文学上的“共鸣”现象与山水诗问题、戏剧冲突与历史剧问题，以及有关中国画、西洋音乐与民族音乐等问题展开了争鸣。所有这些变化，都给文艺发展带来了良好的转机。遗憾的是，这个转机还没有来得及从根本上改变文艺的面貌，便迅即为“左”倾思潮泛滥的新浪头所吞没了。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林彪、江青一伙野心家、阴谋家，利用了指导思想上的“左”的失误，打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幌子，极力夸大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选择文艺领域作为突破口，开始了篡党夺权的活动。他们从批判《海瑞罢官》入手，煽动极左思潮，在文艺批评中大搞牵强附会、唯心主义的“影射学”。从1963年到1965年，对一些有影响的文艺观点和一大批文艺作品（如对昆曲《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写中间人物”论与“现实主义深化”论，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不夜城》、《林家铺子》等四部所谓“修正主义”影片）发动了全国性错误的、过火的政治大批判，形成了“十七年”文艺思潮“左”倾的高峰。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从“大跃进”到“文革”前夕，文艺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之”字形的曲折。即从存在“左”的错误倾向到认识和否定这一倾向，再到这一倾向的被重